

鉢水文約



鉢水齋叢書

蘇淵雷著

鉢水齋約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

鉢水文約（全二冊）售價 元

著者 蘇淵雷

發行人 蘇淵雷

出版者 鉢水齋

南京薛家巷八號轉

印刷者 中央宣傳部南京廠

國民印刷所南京廠

南京三茅宮俞家巷十六號

經售處 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素成極後之難到
且淚盡而不可珍
弱媿空文侯習苑
空鎖一夕時到人

丁亥仲夏 錄此日

鉢水文約

卷一

文化綜合論 一九三四年

論哲學之戰鬥性與實踐性 一九三六年

與張季同書 一九三六年

論智識分子四型 一九三六年

詩與唯物論之合抱 一九三六年

卷二

孔學三稱序 一九三五年

廣聖哲叢集記 一九三六年

目次

宋平子先生之生平與思想 一九三六年

與歐陽竟无老居士書 一九三九年

太炎先生早歲與中山先生論政之異同 一九四〇年

世界名家語錄序 一九四〇年

民生哲學引義述旨 一九四一年

章學誠新傳 一九四二年

敬悼歐陽竟无大師 一九四三年

論我國學術發展之新途徑 一九四三年

卷三

雁蕩山游記 一九二六年

冰雪文稿序 一九三四年

十八家詩鈔題記 一九三四年

友人蔡君思牟事狀 一九三六年

祭蔡母葉太夫人暨志兄思牟文 一九三九年

陪都賦並序 一九四〇年

贈普考訓練班第一期同學序 一九四〇年

送林烈敷先生奉命宣慰康滇夷民序 一九四三年

明所緣起 一九四五年

家母六十壽啓 一九四七年

卷一

文化綜合論

一九三四年

一 問題的提出

時至今日，資本主義已達到最後的階段，有機地發展的時期已經過去，現在正是它實行『自我批判』的時候了。

近代可驚的生產力之發展，引起交通技術迅速的進步，物質財富之龐大的蓄積，顯着分配關係極度的不均；一方將社會內部分為二大陣營，同時將全世界打成一片，資本主義的浪潮衝破了中國的萬里長城，驚醒了沉睡千年的農業國的國民。全世界生活的緊張與敵對的尖銳化，以同速率增進。如其說商人是國際文化的最初溝通者，則貨幣無疑地是代表最先的世界語了。

在今日，經濟的領域上有托辣斯，辛地加等超國家的組織；在政治的舞台上，又有國

際聯盟共產國際等的存在；在文化的分野上，該有新的國際文化誕生吧！

如其問題的提出，須視足以解決此問題的客觀條件已否形成或將形成爲斷；則文化綜合問題的提出，想來不致於過早吧？

二十世紀是批判的時代，同時又是綜合的時代。在今日，無論何人何國，談經濟、政治乃至文化種種的改造，已非『復歸甚麼』或『復興甚麼』所可濟事的了，在經濟上，任你『復歸原始社會』或『復興資本主義』，都不能救垂死的經濟的末運；政治上，任你『復歸凱撒』或『復興帝國』，亦不能挽既倒的政治的狂瀾；在文化上，任你『復歸孔子或康德』、『復興希臘或羅馬』，也不能維持資本主義沒落期的糜爛文化了。

然而『創造』與『移植』，同樣是虛妄與不合算的手法：空中城郭與華嚴樓台是不能實現的美景，烏托邦與華胥國也徒成可憐的故鄉；資本主義燦爛的金字塔聳立在封建社會的廢墟之上，微妙香潔大如車輪的蓮華須植根於污泥之中；離開現實，侈言創造，乃是不能充饑的畫餅。至於『移植』，亦不盡合時宜：據說淮南之橘，渡江爲枳；而廣東木棉

，遷地弗爲良；同一社會主義，在德國表現爲社會民主主義，在法國變成工團主義，到英國又成爲費邊主義與基爾特主義了。『移植』之爲無望；正與『創造』相同。

所以在今日，無論何人何國，談文化或是政治經濟，只有出諸『綜合』之一途。

但『綜合』的先行程序是『批判』。沒有批判的綜合，是機會主義的『綜合』，沒有綜合的『批判』，是無政府主義的『批判』。現在的綜合，已不是物理的機械的『混合』，而是化學的有機的『化合』了，也不是架空的觀念之連絡，而是依存於經濟基礎之真實的適應了。

雖說歐洲曾經溝通過希臘與希伯來二大思潮而產生近代輝煌的文明；雖說中國曾吸收印度佛學而產生宋明燦爛的理學；然而現階段的文化綜合之意義，無論時間地或空間地說來，其規模的宏大，內容的豐饒，已非前者所可比擬。

雖說康德有過批判哲學的理論，斯賓塞備有過綜合哲學的著作，然而我們將從事的批判與綜合，無論內容或形式上看，都與前者異趣。

並不是我們的智力突過前修，也不是我們的見識遠於古人：實在是我們生當世局劇變的今日：山川的險阻克服了，異民族間文化的接觸已暢辟向裏；人類祖先無數經驗的積蓄，形成智慧之最大的寶庫；過去無數學者像螞蟻般替我們搜集好材料，現在是需要我們做蜜蜂的時候了！——百花采罷，該釀點好蜜供給世人吧！

在歷史上采得好花釀成好蜜的，頗不乏先例：個人的代表，近代 孫中山先生足當其選。中山之三民主義，係採取儒家的倫理學和政治哲學，復吸收近代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合理部分，加以補充，修正，而形成他自己莊嚴的主義。民族的代表，蘇俄實表現其可驚的努力，革命後十餘年來政策屢更，但其關於經濟機構政治組織以及教育設施，無不通過社會主義之最高原則與一貫的精神；而又不礙其滲入俄羅斯歷史的成分與地方的色彩。其最高的綜合之能力與成績，實在可作我們的先導。

世界文化的支流，在古代獨自發展自成一系列的約有四支：西方有希臘文明與希伯來文明；東方有印度文明與中國文明，中古以後，希伯來思潮與希臘思潮混合，中國文化與印

度文化也互相接觸，到近代，只有條頓民族爲主的歐洲文化與以中國爲主的亞洲文化兩大潮流了。

近代史家，每以調和東西文化爲新時代的課題。但當世界文化兩大支流，愈流愈近，快將合龍入海的時候：我們不應止於坐談，應起而力行，學一學治水的大禹探索地脈，因勢利導，不致洪水橫決或渟蓄不流；這才能收事半功倍千載一時的奇勳啊！

二 歷史的回顧

自來講調和東西文化或溝通中外學術的人，國內外頗不乏人；高唱這種運動，算來也有好幾十年的歷史了；而成果終於稀少，範圍終不擴大。

在中國，文化運動約經三期：三十年前主持文化運動的人物，如作爲新興地主階級代言人的士大夫康梁等之啓蒙維新運動，努力開通風氣，提倡新學，所至如康南海的大同書，譚嗣同的仁學，治孔佛華梵爲一爐，論古今政教之同異，時有勝義；但限於時代，不免

備。同時，嚴又陵翻譯原富、社會通論、天演論、羣學肄言諸書，影響學界甚鉅，所譯書每加按語，比證中外政教學術，頗得旨要。嚴氏係西洋留學生，故取言較切實有據；然嚴氏思想頗保守，對於康梁之維新運動，已有微辭，遑言其它？至章太炎既湛深經學，復諳佛典，居東時得讀日譯希臘德意志諸哲人書，為學獨有會心。彼嘗識並世嚴復為「知總相而不知別相」，沈曾植為「知別相而不知總相」，觀其所作，實足稱此，然微言緒論，雖足資印證，亦無體系可言。平心而論，初期主持文化運動諸人，雖嚴確精深之度稍遜，然其啓蒙國民思想，樹溝通文化之初基，厥功甚偉。

其次，是十餘年前的新文化運動了。這時的智識份子，都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反映着新興資產階級的思想。在極端攻擊舊文化與歡迎西洋文化之氛圍氣中，進行二種工作：其一為政治運動的自覺，連帶而來的便是西洋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產物的民主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想的輸入；其二為文學革命的提出，具體內容表現為白話文學的建設，與西歐文藝思潮著古典、若浪漫、若自然、若唯美等主義之移植。

現世界本已是動盪着，社會失其內部均衡而文化表現爲矛盾錯綜的時代；中國自辛亥革命後，正是封建勢力猶存，資本主義未樹立，同時被國際帝國主義強姦，孕育着畸形的經濟體制：一方面在農村中，貨幣經濟的不發達，現物地租的存在，處處表示封建勢力佔優勢；同時，在城市裏，有現代最新的全業組織，有真正的產業工人，有商業資本主義都市的繁榮，處處表現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地主與新興資本階級脫不了買辦的性質，而農民階級的無產化日趨嚴重。龐大的中國，其社會內容的多样化與矛盾性，無與倫比。即在大都市中，以言物，則羊角車與摩托卡同軌，小舢板與大輪船競渡，高樓大廈與古矮平房比街；以言人，則道老道小與魔僕魔伽固不妨同聚於一堂。軍閥官僚名流政客亦無害其同牀而異夢。因社會經濟層的龐雜反映爲文化上的亂象，一般社會的存在，決定于各自的意識。因而在歐美須相隔數十年乃至數百年始互相取代的各種主義，在中國不妨一時一地而並存，一朝一夕而足改。老實說，新文化運動所成爲的只不過文學革命的一部——文體革命，與資本社會個人主義的思想的猖獗而已。此外，作爲其副產品而轉入下期，運動漸趨實

際化的，則有社會主義的運動。

雖說當時運動的傾向是極端詛咒舊文化，但「整理國故」的主張與討論東西文化的人，實繁有徒，照理，這期人的談東西文化，應較他們的先行者康梁嚴章諸人爲猛勇精進，鞭辟向裏，然而事實上殊少突過前修之處：

一、胡適已失却有機的綜合的精神，但求點滴的改造，局部的試驗與支離破碎的方法論（包括實用主義與所謂清儒的治學方法；作爲方法論的實用主義的缺點有四：（一）止於事實之局部的現象的觀察而忽視其全體性與本質；（二）以主觀的效用大小估計真理而忽視其客觀性；（三）死用歸納法與「拿證據來」而忽視抽象法與綜合法之應用；（四）徘徊於多元的妥協的見解，而無一元的革命的思想。至於漢學方法，至多亦不過求「其然」而已，進一步求其「所以然」，則非彼所能。其弊所至，易使人泥物而喪己，見木不見林，漢學者不參以宋學，以之求真理，終無是處；此章太炎氏參用漢宋，所以其學能高出乾嘉以來樸學者一籌也）而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二、梁漱溟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為主觀所囿，徒有麟爪的認識，未達全體的披露。如謂西洋生活是直覺運用理智，中國生活是理智運用直覺，印度生活是理智運用現量；又說西洋人的生活態度向前，中國人是持中，印度人是向後等，都有問題。

三、陳仲甫、李守常等思想較為前進，然一談到東西文化問題，仍不離形而上學的意味，作些不相容的對立的論斷（如謂東方文化是安息的，家族的，感情的，庸文的；西方文化是戰爭的，個人的，法治的，實利的。或謂東方主靜，西方主動等）。至於東西文化之本質及社會的關係，未行嚴正的剖析，故不免觀念模糊。

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後，社會經濟與政治，起了絕大的變革。由一般階級層的分化，引起智識份子的分化，和文化革命的要求；而文化上之『批判』與『清算』的運動以起。這才跨入了中國文化運動的第三期。

這期主持運動的人物，有不少是給革命的狂飆吹散出來的，他們獲得一種新的方法論，一種新的批判的武器。於清算五四以來唯心的、個人的、不徹底的思想，頗有功績。

可惜從事者多傾向文藝方面，又因過於重視文藝的政治的性質，而忽視其本身的特性，致運動上失却種種可資借鏡的理論與充實的內容，徒增長一些不必要的葛藤，往往組織的形式主義妨礙着文藝發展的前途，而寫作者常成爲「藝壇的祭司」。一般作家對於文藝理論和社會科學基礎智識少有深進的認識，實爲不可掩飾的事實（極少作家例外）。此外關於中國社會史、哲學等的問題的討論，亦進入了新的階段，新方法論的運用，範圍漸廣，成績也漸有可觀。但不免誤於機械的運用，與急遽的求結論；往往爲求取勝於人，故立異義，以取悅貴耳賤目熱情掩過認識的一般讀者。雖說如此，畢竟走的路徑是正確的。所做者，在研究的領域上，還未深化、廣化，慣於假借權威公式，以代替精密的、特殊的研究，而自足於一般的概念之陶醉，其結果森林掩了樹木的個性，而馬鈴薯的一袋轉成一袋的馬鈴薯。他們只消極地批判，不善用揭棄的手法，從朽腐裏取得神奇，或從廢墟裏獲得礎石，自成新體系；自己局促於狹隘的智識圈中，不敢馳騁異域，深入敵人陣營，客氣與市儈氣在文字間不時流露。所以在中國，像狄慈根、普列哈諾夫、伊里奇、盧那卡爾斯基、傳